

湖南省旅游经济的地区差异与动态收敛性研究

郑群明^{1, 2} 姜奎¹¹

(1.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2. 湖南师范大学 旅行研究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以湖南省2000~2018年14个市(州)人均旅游经济为研究对象,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测度湖南省旅游经济的地区差异,继而利用收敛理论检验全省及四大旅游圈的收敛特征。结果表明:(1)全省及四大旅游圈人均旅游收入空间差异特征突出,地区间差距是造成湖南省旅游经济差异的主要来源,地区内差距与超变密度呈缓慢下降趋势。旅游差异主要集中在大湘西和长株潭两大旅游圈。(2)全省及四大旅游圈不仅存在 σ 收敛,也都存在条件 β 收敛,同时全省和环洞庭湖、大湘西、大湘南三旅游圈也存在绝对 β 收敛。(3)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固定资产投资额、城镇化率、交通通达性和信息发展水平均对全省及四大旅游圈旅游经济的收敛产生较强的影响。

【关键词】旅游经济 地区差异 Dagum基尼系数 收敛性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227(2020)11-2396-10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旅游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综合性强、拉动力大、覆盖广泛的产业,旅游业呈现出强大活力和良好发展态势,为进一步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激发经济潜力、改善民生、促进区域发展提供了原生动力。伴随旅游经济的迅猛发展,地区差异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影响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扩大了贫富差距,差异性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与政界关注的热点话题^[1]。因此,深入研究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状况,差异现状、演变认识、差异形成的来源,差异演化是否收敛等问题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对中观尺度旅游经济发展现状及其特征的宏观认知,更重要的是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切实缩小地区差距等提供现实的参考依据。作为中部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的湖南省,具有旅游资源丰富、内部差异大、区域发展明显等显著特征,将其作为案例地来研究旅游经济差异、动态收敛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促进旅游经济空间格局优化、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国外学者对旅游经济差异性问题相关研究开展较早。研究初期,西方学者大多将研究重点放在旅游经济对本国及本地区的促进作用^[2,3],认识到旅游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影响力不断扩大^[4],并认为旅游经济与地区发展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5,6]。旅游发展的空间差异影响到区域发展协调性的提升,西方学者开始注重旅游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非均衡效应^[7,8]、时空差异特征^[9]、空间结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10,11]。受国外研究理论与范式的影响,针对中国旅游经济时空差异性的研究不断涌现。在研究尺度上,多以国家、经济带、省域以及特定地区为研究对象^[12~14],从多尺度研究旅游经济的时空差异性。例如陆林等^[12]以中国大陆3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旅游经济的差异变化及其空间结构特征;在研究内容上,主要涉及旅游经济差异性分析、空间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15,16],从时空二维视角探析影响旅游经济时空差异的影响因素,对区域均衡发展具有推动

¹**作者简介:** 郑群明(1972~),男,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开发影响、森林旅游与山地旅游. E-mail:464316927@qq.com
姜奎 E-mail:2393357043@qq.com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JD48)。

作用。例如郝金莲等^[16]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方法上,社会网络分析、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15, 17, 18]广泛被应用在旅游经济差异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中。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旅游经济的贡献、时空分布特征以及差异化做了丰富的研究,为本文的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对于研究视角而言,我国当前基于旅游经济差异化的研究更加集中于省域、城市群以及某些特定的片区视角展开,而以省域内不同旅游圈旅游经济差异化的相关研究较为少见,故而考察旅游圈旅游经济收入差异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与研究价值;研究方法上看,鲜有学者在旅游经济时空差异的基础之上,同时运用相对 σ 收敛、绝对 β 收敛以及条件 β 收敛分析区域旅游经济的收敛性特征。该方法是辨别区域差异走势的理论方法,能有效的测度出地区人均旅游收入差距随时间推移发生特征变动的趋势研究;研究内容上,旅游经济条件 β 收敛的影响因素具象化表述鲜见诸于文献。鉴于此,本文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测算湖南省旅游经济总体及四大旅游圈的空间非均衡程度,从而揭示出湖南省旅游经济区域非均衡性的构成及其来源,最后引入经济收敛理论,运用系统 GMM 方法探寻影响区域旅游经济时空差异的影响因素,试图为中观尺度区域协调发展、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域、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

湖南省地处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结合部,土地面积 21.18 万 km^2 ,下辖 13 个地级市,1 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州)。根据《湖南省旅游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19],按照“一带四圈”的骨架区域旅游发展格局,将全省 14 个市(州)划分为长株潭旅游圈(长沙、株洲、湘潭)、环洞庭湖旅游圈(岳阳、常德、益阳)、大湘西旅游圈(张家界、湘西自治州、怀化、邵阳、娄底)、大湘南旅游圈(衡阳、郴州、永州)。2018 年湖南省旅游总收入 8355.7 亿元,其中,长沙市旅游总收入 1808.05 亿元,位居全省第一,娄底市旅游总收入 331 亿元,仅占长沙市的 18.31%。如此显著的差异分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湖南省区域协调发展,因此,研究旅游经济的差异性对区域协调、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 研究方法

1.2.1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

Dagum 于 1997 年提出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该方法在地区差距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能将湖南省旅游经济总地区差距(G)分解成地区内基尼系数(G_w)、地区间基尼系数(G_{nb})和超变密度(G_t)三部分,分别衡量地区内差距、地区间差异及变量的跨群重叠程度,受到学者们的广泛运用^[20, 21]。

1.2.2 收敛模型

为进一步考察湖南省旅游经济地区收入差异的演变趋势,本文主要从 σ 收敛和 β 收敛两个层面加以检验。 σ 收敛主要是针对产出存量水平的描述, β 收敛则是针对产出增量而言。

σ 收敛检验方法多用于测量人均收入或产出的离差随时间推移是否降低,主要考虑在研究期间内人均旅游收入的离差变化情况^[22],计算公式为:

$$\sigma_t = \sqrt{\frac{1}{n} \left[\sum_{i=1}^n \left(\ln y_{i,t} - \frac{1}{n} \sum_{i=1}^n \ln y_{i,t} \right)^2 \right]} \quad (1)$$

式中: $y_{i,t}$ 表示第*i*个市(州)在时间*t*人均旅游收入, *n*为市(州)的个数, 若 $\sigma_{t+1} < \sigma_t$, 则说明存在 σ 收敛, 即旅游圈内部旅游经济收入水平差距逐渐变小。

β 收敛检验方法是指随着时间推移, 旅游经济落后地区因其具有更高的增长率会逐步追赶上发达地区, 两者之间的差距将会缩小最终达到一致的稳态水平。由于前提条件的不同, β 收敛分为绝对 β 收敛和条件 β 收敛两种情况。

绝对 β 收敛要求每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最终达到相等的稳态, 本文用绝对 β 收敛检验湖南省旅游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是否具有追赶效应。参考已有文献^[23,24], 绝对收敛计算公式为:

$$\ln\left(\frac{y_{i,t+1}}{y_{i,t}}\right) = \alpha + \beta \ln(y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式中: $y_{i,t+1}$ 和 $y_{i,t}$ 分别表示报告期和初期第*i*个市(州)单元人均旅游收入, α 、 β 为待估计参数, $\var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 若 $\beta < 0$, 则表示旅游收入存在绝对收敛。

条件 β 收敛则是在考虑了不同市(州)之间旅游资源禀赋、区域经济水平等方面差异情况下, 各市(州)旅游收入随时间的推移收敛于各自稳定的水平。在绝对 β 收敛模型基础之上加上控制变量后, 即为条件收敛模型:

$$\begin{aligned} \ln\left(\frac{y_{i,t+1}}{y_{i,t}}\right) = & \alpha + \beta \ln(y_{i,t}) + \\ & \lambda_j \sum_{j=1}^n X_{j,i,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3)$$

式中: λ_j 为第*j*个控制变量 $X_{j,i,t}$ 的回归系数。本文验证的是在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后回归参数 β 是否显著小于0, 即旅游低收入市(州)对旅游高收入市(州)是否存在“追赶效应”。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将影响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做为控制变量。甄选3A级及以上级别旅游景区(点)作为旅游吸引力, 借鉴孙根年^[25]的景区等级赋权对A级景区进行赋权(表征旅游吸引力, TR)、人均GDP(表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PGDP)、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GDP比重(表征旅游投资, SOE)、城镇化率(表征城市发展水平, URB)、人均社会商品消费零售额(表征地区消费水平, PCONS)、公路通车里程(表征交通能力, TP)、互联网用户率(表征旅游信息化水平, IL)。为避免数据间可能存在异方差以及考虑到各序列的协整关系, 本文对控制变量取自然对数处理, 将以上控制变量带入公式(3)中, 得到湖南省旅游收入条件 β 收敛的面板数据模型:

$$\begin{aligned} \ln\left(\frac{y_{i,t+1}}{y_{i,t}}\right) = & \alpha + \beta \ln(y_{i,t}) + \lambda_1 \ln TR_{i,t} + \\ & \lambda_2 \ln PGDP_{i,t} + \lambda_3 \ln SOE_{i,t} + \\ & \lambda_4 \ln IRB_{i,t} + \lambda_5 \ln PCONS_{i,t} + \\ & \lambda_6 \ln TP_{i,t} + \lambda_7 \ln IL_{i,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4)$$

条件 β 收敛模型在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 可能致使模型存在遗漏变量和内生性等问题, 对于这样的动态面板, 常采用系统GMM方法来估计参数, 该方法能有效的将水平GMM和差分GMM结合起来, 提高参数的估计效率。在进行参数估计之前, 为避免自变量之间因多重共线问题引起回归偏误, 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对所有自变量进行共线性分析, 发现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的VIF>7, 说

明其很可能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或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存在多重共线性,故剔除变量,将剩下的变量纳入模型分析。

1.3 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客观反映各地市(州)旅游经济发展状况,人均旅游收入是最基础性的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收入增长和发展的成果指标,本文选用此项指标作为旅游经济的观测指标。其中,人口采用常住人口,旅游收入为地区旅游总收入,部分地区旅游收入采用国内旅游收入与入境旅游收入加总得到。影响因素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湖南省统计年鉴》(2001~2019年)、《湖南省各市(州)统计年鉴》,部分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美元的汇率转换按照历年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汇率均值进行转换。

2 湖南省旅游经济地区差异及其贡献来源

根据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本文计算出 2000~2018 年全省和四大旅游圈人均旅游收入基尼系数、差异来源及贡献率。

2.1 湖南省旅游经济总体差异与旅游圈内差异及其演变趋势

图 1 展示了全省及四大旅游圈旅游经济的基尼系数及其演变趋势。从整体上来看,总体及四大旅游圈基尼系数均呈下降趋势,说明湖南全省及四大旅游圈内部旅游收入差距不断减小,旅游圈正逐渐形成并得到稳固。从差异的演变趋势来看,总体基尼系数由 2000 年的 0.5743 下降至 2018 年的 0.3300,年均下降率为 3.03%,表明在整个研究期间,湖南省旅游业协调性增强,各地市间旅游经济差距缩小,但地市间的不均衡程度仍然处于较高水平。长株潭旅游圈基尼系数在 2003 年和 2016 年这两年中,变化形式较为剧烈,可能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旅游圈的划分具有一定的联系,从而使得圈内旅游经济收入差距呈断崖式下降;环洞庭湖旅游圈在 2015 年之前基尼系数呈下降趋势,2015~2017 年呈倒“V”型变化趋势;大湘西旅游圈基尼系数变化形式和总体变化形式相一致;大湘南旅游圈除 2003 年变化剧烈外,其余年份基尼系数基本呈下降趋势。从差异大小来看,大湘西旅游圈内部差距始终维持在最高的水平,全省及长株潭旅游圈位居其后,环洞庭湖和大湘南旅游圈呈交错变化,表明大湘西、全省以及长株潭旅游圈内不均衡现象最为突出,可能是受张家界、长沙两市的影响,致使区域内部协同性比较弱。因此,要使大湘西、全省以及长株潭旅游圈区域内部差异得到持续而稳定的改善,亟须制定并实施相关区域协同发展政策以切实缩小各旅游圈内旅游经济差距,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目标的实现。从基尼系数值缩小速度来看,四大旅游圈分别以年均 9.10%、9.10%、2.44%、5.05% 的速度缩小圈内市(州)差距,长株潭和环洞庭湖两大旅游圈内部差距缩小速度最快,说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越好的旅游圈其基尼系数下降速度相对就越快,旅游业的发展与经济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湖南省旅游业在受到外界干扰时,基尼系数呈显著性下降,表明湖南省旅游经济在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时各地区间的差距会出现显著波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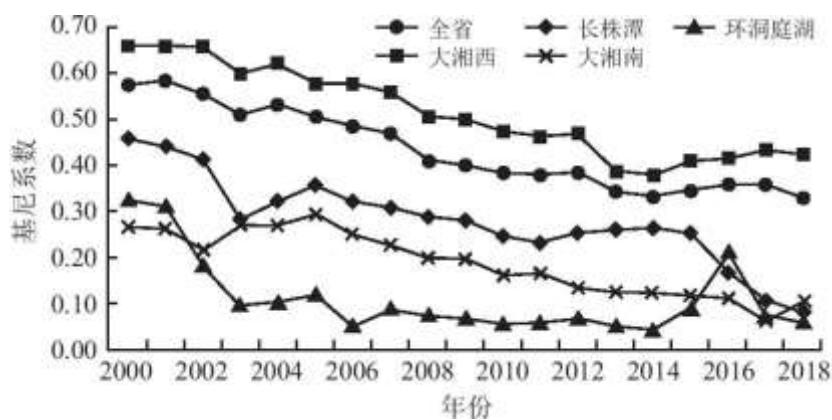


图 1 全省及四大旅游圈基尼系数的演变

2.2 四大旅游圈区域间差异

图2描述了旅游经济地区间差距及其演变趋势。可以看到，在研究期内，旅游经济地区间差距虽经历了反复的上升一下降，但整体仍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从差异大小来看，在大多数年间，大湘西与大湘南之间的差距最大，环洞庭湖与大湘南两地区间差距最小，其它地区间差距均呈现出交织波动的趋势。通过比对原始数据我们发现，在多数年份中大湘西和大湘南地区间旅游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大湘南和环洞庭湖两旅游圈中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程度高，而大湘西旅游圈中张家界旅游收入最为突出，扩大了圈内的非均衡性。从具体演变过程来看，将地区间的差异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04年)，这一阶段地区间差距呈上升一下降一再上升的变化趋势，除2003年地区差距显著下降外，其它年份基本围绕各自均值上下波动，本阶段是湖南省旅游业发展的起始阶段，地区间的差距主要来源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第二阶段(2005~2014年)，此阶段地区间基尼系数呈近直线型下降趋势，各地区间基尼系数下降幅度明显，表明本阶段湖南省各地市开始扩大并经营旅游业务，地市间旅游经济差距缩小；第三阶段(2015~2018年)，此阶段地区间基尼系数呈倒“V”型变化结构，意味着在经历了短暂的旅游圈的调整以及政府对旅游产业的重新定位后，各地区开始大力发展战略业务。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长株潭与环洞庭湖之间的差距演变成区域间最大的差距，而环洞庭湖与大湘南之间的差距仍是最小。综上，环洞庭湖和大湘南两旅游圈旅游经济差距相对较小，长株潭、大湘西两旅游圈与其它旅游圈差距相对较大，旅游圈间旅游经济发展协同性弱的现象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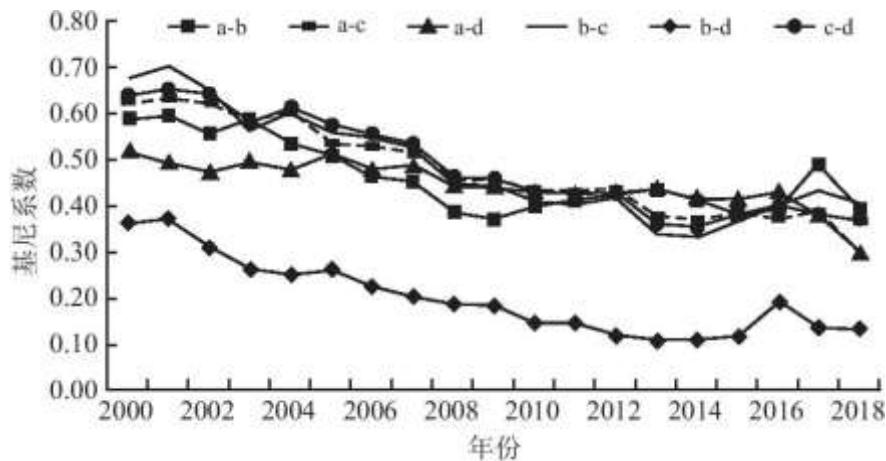


图2 四大旅游圈地区间基尼系数及其变化趋势

注：图中a、b、c、d分别代表长株潭、环洞庭湖、大湘西、大湘南四大旅游圈。

2.3 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率

图3描述了旅游经济的地区差距来源及其贡献率。从基尼系数的分解及各地区差距来源、贡献率的变化可以发现，湖南省旅游收入地区间差距产生的内在机制发生了变化。从图形的特征来看，地区内贡献率基本处于稳定状态，超变密度呈缓慢下降的变动趋势，地区间贡献率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并占据主导地位，说明地区间差距是造成湖南省旅游经济差异的主要来源。从具体的演变形式来看，可将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划分为两个阶段。以2004年为分水岭，2004年之前，地区间贡献率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地区内和超变密度贡献率呈缓慢减小的变化趋势，在2003年奠定了地区间贡献率的主导地位。2003年之前，超变密度大于地区的贡献率。2004年之后，3种来源的贡献率开始分化，地区间差距贡献率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到2018年地区间差距贡献率高达50.15%，说明研究期内湖南省地市间旅游经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当前亟须解决的社会矛盾。超变密度缓慢下降，并在2012年之后围绕地区内差距贡献率上下波动，到2018年，超变密度的贡献率仅为26.78%，而此时，地区内贡献率下降至23.07%。超变密度主要用来反映地区间的交叉程度，超变密度降低，说明地区间交叉重叠的现象逐渐消失，地区间差距更明显，地区内基尼系数贡献率的降低，表明旅游圈内差距缩小，各地市旅游经济得到稳步的提升，旅游圈内可能存在俱乐部收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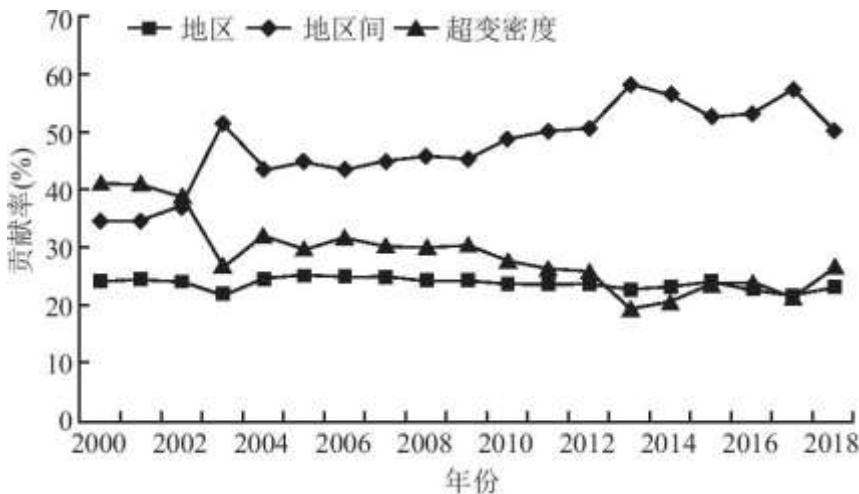


图 3 地区差距贡献率及其演变趋势

3 湖南省旅游经济收敛性实证分析

3.1 σ 收敛

图 4 展示了全省及四大旅游圈人均旅游收入 σ 变化值。就整体而言, 2000~2014 年 σ 值从 1.1261 下降至 0.5590, 此后稳定在 0.5449~0.6083 之间, 虽然研究期内个别年份 σ 值有所增加, 从总体来看全省人均旅游收入 σ 收敛在下降的过程中并未出现较大的波动, 表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说明湖南省各地市之间人均旅游收入相对较为均衡, 内部差异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缩小。按四大旅游圈分别进行 σ 收敛检验, 长株潭、环洞庭湖、大湘西、大湘南四大旅游圈虽有不同程度的波动情况, 从长期来看四大旅游圈均呈现出下降的变化趋势, 存在 σ 收敛。综上分析, 湖南省及四大旅游圈人均旅游收入标准差在时间推移上虽均未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 但均表现出一致性的收敛趋势, 所以判定它们存在显著的 σ 收敛。但从收敛速度上来看, 全省及四大旅游圈人均旅游收入分别以年均 3.95%、9.07%、11.34%、3.01%、6.46% 的速度收敛, 长株潭、环洞庭湖两大旅游圈的收敛速度显然要快于大湘西、大湘南两大旅游圈, 短期内不存在明显的“追赶”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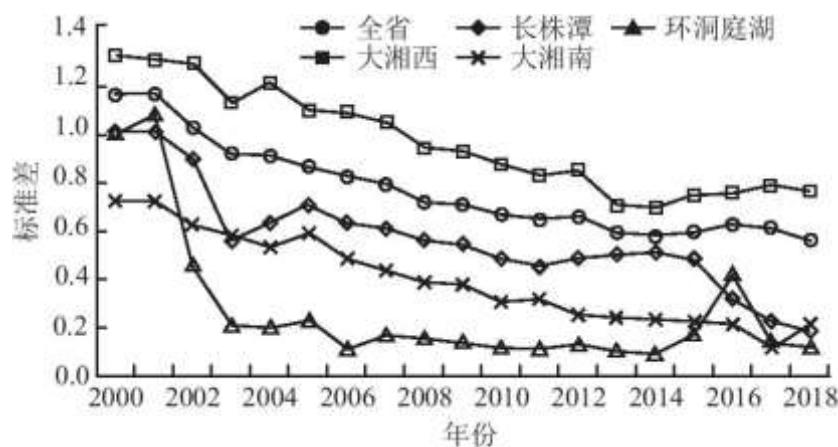


图 4 全省与旅游圈旅游收入 σ 收敛趋势

3.2 绝对 β 收敛

由于截面数据无法准确说明收敛的连续性,使用截面数据进行旅游经济收敛检验时,得出的结论与时间跨度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因此,本文根据已有研究^[26],采用双向固定面板效应模型将时间和地区效应进行控制。与此同时,将湖南省按照全省、四大旅游圈划分,考察3个不同经济周期(2000~2018年、2000~2010年、2011~2018年)内湖南省人均旅游收入的差距绝对收敛。

表1汇报了湖南省及四大旅游圈人均旅游收入绝对 β 收敛检验结果。全省范围内3个时间段参数 β 估计值均通过5%显著性水平,说明在研究期间全省人均旅游收入整体呈绝对 β 收敛,较低旅游收入市(州)对较高旅游收入市(州)具有“追赶效应”。对全省旅游业分时段 β 收敛速度进行检验,其收敛程度为-0.2413(2000~2018年)、-0.2811(2000~2010年)和-0.2866(2011~2018年),意味着湖南省旅游业在市(州)间不同时段内以不同的收敛的速度向相同的稳态均衡水平收敛,且收敛程度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湖南省各市(州)间旅游行政壁垒正逐渐被打破,旅游联动性得到加强,全域旅游的建设、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已初步形成。

运用公式(2)对四大旅游圈分别进行绝对 β 收敛检验。长株潭旅游圈除在2000~2010年阶段系数估计值 β 通过显著性外,其余研究阶段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是因为旅游圈内长沙市的旅游经济发展速度快,拉大了地市间的旅游经济差距,协同发展能力差,短期内较难呈现出显著的绝对 β 收敛。环洞庭湖旅游圈在2000~2010年阶段中,绝对 β 收敛不显著,但在整体以及其它研究期内,具有较高的收敛系数,说明环洞庭湖旅游圈内部地市协调性较高,旅游经济的差距将随时间的发展而缩小。大湘西旅游圈在整体研究期及分阶段研究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收敛系数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说明大湘西旅游圈在湘西开发中,各地市(州)抓住旅游发展机遇,合理利用旅游资源,缩小了区域内的不均衡程度。大湘南旅游圈在三阶段研究期内均通过绝对 β 收敛显著性检验,且 β 系数值为负,说明近年来大湘南旅游圈内各地市旅游经济差距呈缩小状态,各地市之间的旅游经济差异变小,协调性增强。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比两阶段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回归系数,我们发现,2011~2018年阶段,旅游经济收敛程度显著大于第一阶段,说明在本阶段,湖南省政府开始注重对偏远地区旅游业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湘东、湘西差距,同时也缩小了旅游圈内部差距,旅游业在湖南省呈全面发展的态势。

表1 湖南省旅游经济绝对 β 收敛检验

年份		全省	长株潭	环洞庭湖	大湘西	大湘南
2000~2018	β	-0.2413*** (0.0644)	-0.2471 (0.1595)	-0.3445* (0.1906)	-0.1824*** (0.0590)	-0.1665** (0.0759)
	α	1.6695*** (0.4372)	1.7436 (1.0792)	1.8194 (1.1170)	1.0168*** (0.2468)	1.0093** (0.4097)
	地区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3136	0.4354	0.5274	0.4215	0.6691
	F	2.5400	2.4000	2.0900	2.1900	4.1000
2000~2010	β	-0.2811*** (0.0910)	-0.4831* (0.2510)	-0.2935 (0.2149)	-0.2102*** (0.0757)	-0.1954* (0.1093)
	α	2.0106*** (0.6320)	3.3712* (1.7298)	1.5407 (1.2298)	1.1223*** (0.3099)	1.1523* (0.5664)
	地区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R ²	0.3663	0.5013	0.5694	0.4481	0.6788
	F	1.9600	1.1300	2.4600	1.8800	2.1500
2011~2018	β	-0.2866** (0.1366)	0.0230 (0.1534)	-0.7741*** (0.2130)	-0.7133** (0.2982)	-0.6287** (0.2294)
	α	2.7261** (1.2350)	-0.0252 (1.3611)	6.3045*** (1.6502)	5.2255** (2.0894)	4.9651** (1.7299)
	地区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R ²	0.2475	0.5151	0.4762	0.5720	0.7958
	F	1.4800	5.4000	2.5300	2.6400	4.4900

3.3 条件 β 收敛

表2报告了湖南省旅游经济条件 β 收敛结果。在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无论是全省还是四大旅游圈,β 估计值都显著不为零,且全部为负,这表明旅游经济在全省及四大旅游圈均存在条件收敛,全省及四大旅游圈旅游经济空间差异将随时间的推移,呈不断缩小的趋势,存在落后地区的“追赶效应”。就收敛程度上来看,与全省相比,长株潭旅游圈、环洞庭湖旅游圈较强,而大湘西与大湘南旅游圈相对较弱。因此,湖南省全省及三大旅游圈既存在绝对收敛,同时也存在条件收敛。其中,长株潭旅游圈不存在绝对收敛,但存在较强的条件收敛。

就控制变量对旅游经济影响而言,从全省层面上来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PGDP)与旅游经济的变化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本文是以年度人均旅游收入来表征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所以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地市,其旅游经济增幅会不断增大,上升速度会持续加快,而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缓慢的地市,其旅游经济增幅将会减缓,换言之,在全省尺度上,经济发展水平快的地市促进了地区旅游经济的增长,进而加快了地区间旅游经济的收敛过程。长株潭、大湘西、大湘南旅游圈表现出了与全省尺度相似的现象,经济发展水平增速快的地市对旅游经济增长、以及缩小区域内部差异作用更显著,大湘西、大湘南的促进作用大于长株潭与环洞庭湖旅游圈。而对环洞庭湖旅游圈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旅游经济收敛不显著。

表2 湖南省旅游经济条件 β 收敛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全省	长株潭	环洞庭湖	大湘西	大湘南
LnIy	-0.2120*** (0.0704)	-0.4334*** (0.0779)	-0.5283*** (0.0403)	-0.1308*** (0.0382)	-0.1201*** (0.0809)
LnGDP	0.1121*** (0.065)	0.3138*** (0.0261)	0.0979 (0.2104)	0.3461*** (0.0227)	0.4278* (0.2305)
LnTR	0.0636* (0.036)	0.1004*** (0.0183)	0.17766* (0.0939)	-0.0017 (0.0227)	-0.3098 (0.0302)
LnSOE	0.1120 (0.0856)	0.4012** (0.1825)	0.2870** (0.134278)	0.1991* (0.11045)	0.0155 (0.08329)

LnUBR	0.033** (0.0135)	0.0170*** (0.0036)	0.4342 (0.4099)	0.1748 (0.2095)	-0.0659 (0.3111)
LnTP	-0.1041** (0.0512)	-0.1310*** (0.0175)	0.1382*** (0.0299)	-0.2258** (0.0934)	0.0217 (0.1430)
LnIL	-0.0333 (0.0484)	0.1188*** (0.0301)	0.0730*** (0.0089)	-0.1293* (0.07432)	-0.1370** (0.0556)
constant	-0.4652 (0.4745)	1.1343** (0.5684)	-1.5517* (0.8001)	-1.1737*** (0.3552)	-2.8782* (1.6354)
地区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Number of obs	252	54	54	90	54
Number of groups	14	3	3	5	3
Wald chi2	31760	31.05	74.52	97.19	10.94
Sargan test p value	0.2948	0.7094	0.8996	0.2619	0.3245

从旅游资源禀赋(1nTR)上来看,全省及长株潭、环洞庭湖旅游圈均呈现出正向促进作用,而对于大湘西及大湘南旅游圈来说,旅游资源禀赋并未凸显出显著作用。一方面,旅游资源分布不均是造成湖南省旅游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落后地区因具有较高的旅游品质与资源禀赋,促进了旅游经济的收敛作用,缩小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对于经济基础运营良好的地区而言,旅游资源是相对落后区发展旅游业的有力抓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大湘西与大湘南旅游圈因圈内旅游资源分布不均,旅游收入主要集中在张家界与郴州两市,在一定程度上旅游资源禀赋对于旅游经济收敛呈现出抑制作用。就固定资产投资占比(1nSOE)来看,长株潭、环洞庭湖以及大湘西旅游圈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全省及大湘南旅游圈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湖南省及大湘南固定资产投资方向上看,投资偏向民生投资、基础社会投资、工业技术投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而关于旅游业直接投资占比相对较少,故而固定资产投资对旅游经济收敛作用不显著。从城镇化发展水平(1nURB)上来看,全省及长株潭旅游圈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其它旅游圈不显著。城镇化发展水平不仅表征常住人口数量,同时也代表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27],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扩大了旅游产业的联动性。环洞庭湖与大湘南旅游圈其内部城镇化发展水平相近,对旅游经济的收敛作用难以产生明显的差异作用;大湘西旅游圈城镇化水平低,对于旅游经济的收敛作用弱。就交通通达性而言(1nTP),除了大湘南旅游圈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它旅游圈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变量的回归系数中只有环洞庭湖旅游圈显著为正。说明对于全省及其它旅游圈而言,旅游交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空间非均衡性,湖南省旅游交通优势主要集聚在长株潭旅游圈^[28],区域交通的非均衡型对于旅游经济的收敛起到了阻碍作用。长株潭旅游圈交通优势度主要集中在长沙市,与之相对应的是大湘西旅游圈,张家界的交通网络优势度在圈内最佳^[29],高速发展的交通水平扩大了旅游圈内旅游经济的差异性。从信息化发展水平(1nIL)来看,长株潭和环洞庭湖旅游圈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对旅游经济收敛呈正相关,而大湘西、大湘南两大旅游圈对旅游经济的收敛呈显著的负相关,这说明信息化发展水平并未显著改善湖南省旅游经济的发展,甚至出现信息化的加入扩大了地市间旅游经济差距的现象。诚然信息化发展水平极大的改变了旅游业的运行方式,同时加速了旅游产品的更新换代,提升了旅游信息的传递,但地方政府对信息化发展水平的资金投入捉襟见肘,有限的资金投入也并未直接转向信息化水平的基础建设方面,因而信息化发展水平对湖南省旅游经济收敛作用不显著,但政府资金的投资偏差所带来的旅游经济收敛效应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果。

4 结论与对策

以湖南省2000~2018年14个市(州)人均旅游经济为研究对象,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测度地区差距及贡献来源,在此基础上,引入收敛理论,构建动态面板收敛估计方法对湖南省全省及四大旅游圈是否收敛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如下:(1)人均旅游收入数据表明湖南省各地市(州)之间旅游经济差异性突出,地区间差距是造成湖南省旅游经济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

地区内贡献率以及超变密度贡献率均呈缓慢缩小的变化趋势,部分旅游圈可能存在俱乐部收敛。研究期内,湖南省人均旅游收入内部差异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大湘西和长株潭两旅游圈;(2)就收敛特征来看,其一,全省及四大旅游圈旅游经济均存在 α 收敛,且长株潭、环洞庭湖旅游圈收敛速度快于大湘西与大湘南两旅游圈。其二,就绝对 β 收敛特征来说,全省及环洞庭湖和大湘西、大湘南旅游圈在整个研究期内均存在绝对 β 收敛,也就是说在基础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全省及环洞庭湖和大湘西、大湘南旅游圈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会收敛至同一水平状态。其三,就条件 β 收敛特征来说,全省及四大旅游圈收敛系数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并全部为负,说明全省及四大旅游圈都存在条件 β 收敛现象;(3)湖南省旅游收入受控于多重因素的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固定资产投资额、城镇化率、交通通达性和信息发展水平均对全省及四大旅游圈旅游经济的收敛产生较强的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对策。(1)要充分认清并重视地区间、地区内的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分布特征。深入挖掘造成区域间差异显著存在或阻碍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原因及驱动要素。如本文提出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交通通达性等决定性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加大对不发达地区固定资产的投资,给予政策性的倾斜,全面提升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2)地区间差距是造成湖南省旅游经济差异的主要来源,而长株潭与大湘西、环洞庭湖与大湘西、大湘西与大湘南之间的差距均高于其它地区间的差距,基于这一事实,湖南省政府在全面推进缩小地区差距的政策中,仍然要不断的加强对大湘西旅游圈政策的倾斜,借助大湘西地区优势的旅游资源禀赋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以促进省内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3)加速产业融合,优化产业结构。旅游产业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靠乘数效应和拉动效应提升区域经济,但旅游产业的集聚化与单一化会造成对旅游业的过度依赖现象,使得旅游强市(州)依然处于经济落后的现状,所以要加强对落后地区产业的转移,用产业融合来丰富落后地区产品,进而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旅游产业拉动效应,真正做到旅游与经济并轨。(4)在推进旅游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需要注重旅游经济发展的收敛趋势,既要坚持以缩小地区间、地区内旅游经济差距为导向,同时也要兼顾各市(州)间旅游经济的协调性。既要坚持推进落后地区政策性的倾斜与拉动效应的提升,同时也要注重对发达地区的扩大效应。

参考文献:

- [1]ZENG B X, RYAN C. Assisting the poor in China through tourism development:A review of research[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3 (2) :239–248.
- [2]HENRY E W, DEANE B. The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to the economy of Ireland in 1990 and 1995[J]. *Tourism Management*, 1997, 18 (8) :535–553.
- [3]DOGRU T, BULUT U. Is tourism an engine for economic recovery?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J]. *Tourism Management*, 2018, 67:425–434.
- [4]FABER B, GAUBERT C. Tour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Mexico's coastlin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09 (6) :2245–2293.
- [5]OH C O. The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o economic growth in the Korean economy[J]. *Tourism Management*, 2005, 26 (1) :39–44.
- [6]WU P C, LIU S Y, HSIAO J M, et al. Nonlinear and time-varying growth-tourism causalit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6, 59:45–59.
- [7]SANTANA-GALLEGOS M, LEDESMA-RODRÍGUEZ F J, PÉREZ-RODRÍGUEZ J V.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ourism flows:An extension of the gravity model[J]. *Economic Modelling*, 2016, 52:1026–1033.

-
- [8] INCHAUSTI-SINTES F. Tourism:Economic growth, employment and Dutch Diseas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5, 54:172–189.
- [9] CELLINI R, CUCCIA T.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tourism industry in Italy:What the ‘great recession’ data show[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5, 16:346–356.
- [10] DELLER S. Rural poverty, tourism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0, 37(1):180–205.
- [11] SARRIÓN-GAVILÁN M D, BENÍTEZ-MÁRQUEZ M D, MORA-RANGEL E O.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supply in Andalusia [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5, 15:29–45.
- [12] 陆林, 余凤龙. 中国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特征分析[J]. 经济地理, 2005, 25(3):406–410.
- [13] 王洪桥, 袁家冬, 孟祥君. 东北三省旅游经济差异的时空特征分析[J]. 地理科学, 2014, 34(2):163–169.
- [14] 骆泽顺, 林璧属. 河南省旅游经济差异演化特征及收敛性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5, 29(5):197–202.
- [15] 王俊, 夏杰长. 中国省域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QAP 方法的考察[J]. 旅游学刊, 2018, 33(9):13–25.
- [16] 郝金连, 林善浪, 王利. 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时空格局动态性——基于 ESDA&GWR 法[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7, 26(10):1498–1507.
- [17] 陈勤昌, 夏莉惠, 王凯. 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省际差异研究[J]. 世界地理研究, 2019, 28(2):191–200.
- [18] 关伟, 郝金连. 东北地区旅游经济影响因素时空特征研究[J]. 地理科学, 2018, 38(6):935–943.
- [19] 湖南省人民政府.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旅游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的通知. [EB/OL]. (2019-02-28). www.hunan.gov.cn/xxgk/wjk/szfbgt/201603/t20160328_4825518.html.
- [20] DAGUM C. A new approach to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Gini income inequality ratio[J]. Empirical Economics, 1997, 22(4):515–531.
- [21] 辛冲冲, 陈志勇.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分布动态、地区差异及收敛性[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9, 36(8):52–71.
- [22] 高赢. 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发展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9, 36(9):3–23.
- [23] 柏培文, 许捷. 中国三大产业的资本存量、资本回报率及其收敛性:1978–2013[J]. 经济学(季刊), 2018, 17(3):1171–1206.
- [24] 卢庆芳, 赵海程, 曹瑛. 波动与收敛:“5·12”汶川地震后的四川经济发展——汶川地震十年经济指标观察与分析[J]. 财经科学, 2018(11):122–132.

[25] 孙根年, 张毓, 薛佳. 资源-区位-贸易三大因素对日本游客入境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J]. 地理研究, 2011, 30(6): 1032-1043.

[26] 宋建, 王静. 人口迁移、户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性分析——来自 262 个地级市的证据[J]. 人口学刊, 2018, 40(5): 86-99.

[27] 张莅黎, 赵果庆, 吴雪萍. 中国城镇化的经济增长与收敛双重效应——基于 2000 与 2010 年中国 1968 个县份空间数据检验[J]. 中国软科学, 2019(1): 98-116.

[28] 周正祥, 毕继芳. 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优化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9(8): 66-76.

[29] 王兆峰, 李丹. 基于交通网络的区域旅游空间合作效率评价与差异变化分析——以湘西地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16, 36(11): 1697-1705.